

一
胡同生涯



胡同生涯

我和许许多多的老北京人一样，从出生到长大成人都没有走出北京的胡同。又由于父母亲来自江南，在这个旧时皇都没有丝毫前代的根基；加之当年精力十分旺盛的父亲有见异思迁的癖性，所以在我不过十多岁的青少年时代，就从一条胡同搬到另一条胡同，搬了六七次之多。据我现在的记忆，我家住过的胡同约有：小草厂胡同、东四四条胡同、斑大人胡同、遂安伯胡同、金钩胡同、葡萄园胡同、太平街胡同等处。到我十八岁那年去了南方，先去武汉，再去南京，本打算次年即回北京，重度我怀念中的北京胡同的学生生活。谁知道爆发了久所盼望又十分凶险的全民抗日战争，从而迫使我中断了学业，转眼过去了13年。

1949年我结束了长期漂泊的生涯，回到朝思暮想的北京，也就是又进了北京的胡同。从新中国建国当年开始，到1954年我住过三条胡同，就是：西单舍饭寺胡同、西长安街石碑胡同和东单的西观音寺。终于在第四次搬进了属于我个人私有的家，地点在繁华的王府井大街北帅府胡同九号，在

东安市场的背后。

这是我平生第一次用自己从海外挣来的钱买一所属于自己的私宅。主要的原因是把我一生的正直的父亲和为众多子女费尽心力温柔善良的母亲从上海迁居到感情十分深厚的北京来。也为了使我的作为演员的妻子和三个子女能得到很好的休息和工作、学习的环境，我尽力把这个有18个房间和大小两个院子的四合院装修得舒适整洁。院子里原有一棵大海棠树，树叶张开能遮没院子的一半；我把院子的另一半栽了一棵葡萄和一棵合欢树。院子当中树荫下放着一盆梅兰芳先生为祝贺新居送给我的一个大鱼缸……这里是我的小小的安乐窝了。

北帅府胡同的许多住户，我家的邻居，承袭我过去住家的传统——远亲不如近邻，都是亲如一家的好朋友。我们家还是街道上指定开会传达事情的场所，每天出来进去碰头见面的邻居都有亲人一样的感情……但是无论如何料想不到的是，这样的生活只不过是三年，一场反右派斗争便把我驱赶到千里冰封的北大荒，过了三年我回来重整家园，而六年之后等待着我的更大的风暴——血腥的“文化大革命”。

“文革”开始，我被关押在机关里不准回家了。父亲早在我去北大荒当年春天便已故去，这时使我牵挂的就是衰年的母亲、受尽折磨的天才演员的妻子和幼年连遭不幸的三个子女。

关押期间，我两次被造反派通知回家。第一次是被押送回家的，到家后只见院子、屋里一片混乱，院子里满是从屋内扔出来的凳椅杂物，而北房屋里遍地是书籍、衣裳、文

具……显然是刚被抄了家，叫我回去收拾的。母亲和孩子关在西厢房没有出来，只有妻子正蹲在地上清理。由于身旁有人监视，她连话也不敢多说一句。我也只是在清检完毕，又被押回了东四八条胡同监管我的戏曲研究院。临行时我发现地下的瓷砖被挖开了几块，还挖了一个坑，天花板也被打穿一个洞，东墙的壁橱也被挖开了。

第二次通知我回家，只告诉我天黑前一定回来，却没有派人跟我，我不知会发生什么事情，心中七上八下，不知是吉是凶。待我走进胡同“还乡情更怯”的时候，见胡同里竟是静悄悄的，却听见身后有人叫了一声，我回头看是邻居马大妈，她一把拉我进了她家小院，非常紧张地说：“你不能回家。来了一群人等着斗你呐！”我说：“我去看看……”马大妈死死地拉着我不许我去，说：“不能吃眼前亏，这些人畜牲不如。”但是我担心的是家里的亲人。大妈说：“您别怕，他们就是等您一个人。”她叫她的儿子小弟到我家去了解情况，小弟一趟一趟地跑，告诉我那群人只是在骂我，乱翻东西，孩子们都走了，只是母亲和妻子在对付他们。我放了心，直到两个小时以后，小弟高兴地跑回来，说那群坏蛋终于等不及走了。跟着来的是妻子，她一点也不惊慌，不害怕，这一段时间，把她也锻炼出来了。一句话也没有说她便拉着我，叫我回家看母亲。还没走进家门，便看见两扇大红门上用墨笔写着的几个大字：“大右派吴祖光之家”吴祖光三个字上打着大叉子……

到家之后 母亲只说了四句话 是：“胡同里街坊好 凤霞好。孩子都好。你不要担心，我会替你看好家的。”

我告诉凤霞，马大妈母子对我的保护。凤霞告诉我，我家的三条通道，两条是出胡同往西，走帅府胡同出王府井，或走协和医院北墙进三条胡同；另一条路是出胡同往东经煤渣胡同到东单。每次我家来了开斗争会的或抄家的打手们，马大爷、大妈和小弟就分别在三个路口等我下班回来，叫我避开他们……

胡同街坊就是这样地照顾我家，只是孩子们被外祖母带出去了没有看见。而天色黑下来我必须回到单位，我才明白这回为什么要我单身回家的原因。此外，我知道的另一情况，就是这条胡同十二号的另一个“挨斗”的人家是来自延安的赵树理，他没有被关起来，所以斗得更惨。

过了一个月，我得到了自由，回到家里，才发现我家搬进来两户人家，一家是萃华楼饭庄的书记和经理老姜，一是某工厂的工人刘某。两人中的姜的妻子是本街道的干部，由于最熟悉我家的情况，便真会投这个“大革命”之机。姜住了我三间一排西厢房，刘住了三间一排南房；占我家房子，用我家家具，不付房钱，不付水电费，用强光大灯泡，而我家被集中在北房和东房里，被批判、被管制，连灯泡也只敢用小烛的。当然，想他们还允许我家住了宽敞的北屋和东屋，格外施恩，已经该感激不尽了。

情况如此，怎么办呢？我只好和妻子商量把照顾我们生活的淑贤嫂，把哺育女儿双双长大的奶娘凤容，把每天送凤霞上下班、剧场演出的三轮车夫老何同时解散；尽当时最大的可能厚礼遣送。告诉孩子们，从此都要自力更生，照顾自身了；而当年已经七十五岁高龄的母亲就承担了最沉重的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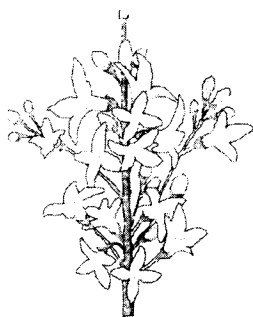
动。她辛苦一世，经历过数之不尽的灾难，难得在今天本该是太平欢乐的年月竟会碰上这样的“人为”大难！尤其是她的四个儿子，七个女儿，除我一人是在受苦受难之外大都平安无事；虽然多少都受了我的牵累，但总算都过得去；母亲本可以去任何一个子女的家里安享清福，但却坚决和最能惹事招非的我家生活在一起。

记得有一天的早晨，我乘坐公共汽车出门，刚坐下来，并坐一起的却是京剧小生叶盛兰，免不了互相问起近况。盛兰告诉我，不止一两家置有私宅的人都发生同样的情况。住房被强占了，从此安静的四合院一下成了大杂院；这些人搬进来，不仅强占了住房，而且欺侮房主人。“住不起可是躲的起”呀，盛兰劝我找到北京市房管局，把现有的住房换到相应的新建楼房。“关上门没有干扰，求个安静吧。”

这是个好主意。这样我把我现在住的八个大房间，外加厨房和洗澡间换了和平里的两套两居室的单元楼房。然而，不过一年时间，由于两个儿子“上山下乡”，我又进了“五七干校”；和平里的街道主任——一个永远面无笑容的中年女干部以她的儿子要结婚为理由，又强占了我住房的四分之一，一个大房间。

从此我离开了住过数十年的，消磨了半生的北京胡同。感觉十分遗憾的，是在受到长年不断的粗暴无理的屈辱之下结束了这段胡同生涯的。甚至于那一所地处王府井的黄金地段的十八间房屋的四合院也就此白白送掉。许多人都认为不应就此做为结束，但我从来不能设想居然会做出和国家讨债这样的行为，就这样结束了罢。

说 1966年和胡同告别，开始了楼居的生活，那就是另一种生活的方式了。纵使告别的悲惨，但是我前面提到的一条条胡同的经历毕竟还是能够回忆起昔时无限的温馨。纵使老年健忘，头一天的事情，当天早晨发生的事情，转眼忘得干净；然而幼年、少年……的回忆却记忆犹新。再说楼居和胡同小院相比当然是一种进化，当年的北京人口只不过 70 万，而今天的北京人口已超过千万。人口猛增，而土地只会减少，当然只有往高空发展。不知不觉我的楼居生活也转眼快 30 年了，楼居亦自有和胡同不同的温馨，足以使我忘却那些无谓的纠缠和不快，随时得到更多的朋友和更多的快乐，那就另外再写了。



父亲的画

我的父亲吴瀛，字景洲，籍贯江苏武进，生于 1891 年，1958 年 67 岁时在北京逝世。我在 18 岁以前是在父母眼皮底下生活的。从那以后，由于抗日战争开始，形势激变，就与家人时聚时散，不能常在一起了。因此对父亲的情况，我的了解不全面，尤其是老一辈的亲人都已谢世，更加无从查询。我的父母多子女。但是惟一比我年长的姐姐又在 41 年前便去了台湾，连这个可能提供情况的人也难于联系了。

我不知道父亲是何年月读完大学课程的，只知他曾就读于我国最早期的外语专科的湖北方言学堂，修英语，毕业后就任东北辽阳中学英语教师，但到职不过一年就和校长发生冲突，一怒之下来到北京。由他的舅父、当时任职北洋政府审计院院长庄蕴宽先生的介绍，进入官场，由内务部科员，不久升任科长。几年后再经过一些升迁，就任于相等于今天的北京市政府的“京都市政督办公署”的坐办职务。在父亲从政期间，他勤恳服官，每天早出晚归，工作是认真的，和同事间的关系也是亲密和睦的。工余时间，没有客人来访的

时候，他的大部分时间都是读书、作画、写字，有时高声用家乡常州的音调朗诵诗词，这是他情绪很好时的表现。另外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每个星期公休日的早晨一定会有不止一个的古玩字画商人带着大包小包的文物来向他兜售，这时候，他总是兴高采烈，和这些风雅商人论今说古，谈的津津有味。

我们这一帮孩子最盼望的是父亲带我们去公园。但这种情况不多，大半是星期天下午，这时古玩商不会来了，父亲也离开了他形影难离的书案。假如能把母亲从家务忙碌中抽出来一起出去走走，那就是全家更加高兴的时候。

看来父亲的爱好是多方面的，但都没有越出文学艺术的范围。他虽然在大学专攻英文，然而对西方文学却兴趣不大。他酷爱的是书画、诗词和图章篆刻，还有文物的鉴赏收购。当然，他没有多少钱，却不断地把旧文物字画买回家来。因此也就不断地负债。逢年过节，各方面的讨账人挤满了外院的“门房”，温柔安静的母亲从来没有疾言厉色，对父亲一向百依百顺，只有在这种债主子盈门的情况之下和父亲争吵过，气得哭泣流泪。但是父亲的习惯从来不改，不断地把大包小件搬回家来。

1924年冬天，北京城里发生了一桩激动人心的大事，革命军队把久已退位但仍住在故皇宫的清废帝溥仪逐出宫外。这个具有五百多年历史的宏伟壮丽的明、清两代的宫殿从这一朝回到了人民中间，并于次年的10月10日成立了空前未有的故宫博物院。

故宫是封建帝王藏垢纳污、同时又是聚宝集珍的巢穴。

清点和鉴定宫中千千万万古代文物，是一桩非常繁重而又精细的需要高度鉴赏能力才能胜任的工作。负责筹备建院，后来被任命为故宫博物院院长的易培基先生以教育总长的身份兼领这项任务，后来成为专任院长。故宫文物由于数量特大，必须动员社会力量，所以不得不延聘大量的古文物专家参加工作，父亲亦成为此项鉴定工作的一员。这项工作十分繁重而艰苦，经过了秋冬春夏将近一年时间，严冬时节滴水成冰，盛夏挥汗如雨，而如此众多的学者专家对此纯属义务性质的工作大都任劳任怨毫无怨言。这里面最主要的，当然是将过去残暴的封建主千百年搜刮民脂民膏而积聚的当今国宝还给人民、公诸于众。此一种振奋心情成为无比强大的精神力量。

那时我还幼小，但是至今还记得父亲当年参加此项“劳动”，每天回家后津津乐道、十分兴奋的神情。严重的情况是，他竟对自己的本职工作日益不感兴趣了，在内务部和市政府他都负有比较重要的责任，但在1925年10月10日，当时的“国庆节”，故宫博物院成立之后，父亲竟脱离了他原来的工作岗位，成为博物院的专职工作人员。现在看来，这完全是一种缺少“政治”头脑的浪漫主义的表现，在父亲的头脑里，显然是个爱好占了主导地位。他这个十分任性的轻率决定使他抛弃了“前途似锦”的官场生涯，遭受了后半生一言难尽的坎坷。

易培基先生是父亲在湖北读大学时代的同班同学，成为鼓动父亲脱离官场参加博物院工作的主要原因之一。但是父亲的愿望其实是落空了，易先生安排他的工作并没有放在文

物方面的学术研究上，而只是利用他的行政工作能力，叫他做秘书工作，成为院长的助手。事情也正是这样发展的，后来故宫由于国民党内部之争发生了震动世界的所谓“盗宝”冤案，当事人的易先生躲入上海租界直迄逝世。重大责任竟落在父亲的肩上，他一身承担后果，公堂受讯，甚至一度遭致通缉，不得不改名远走他乡。对于这所有一切飞来横祸，我没有看到和听到父亲一丝怨愤之色，一句反感之言。后来他做的惟一有力的反击就是，写了一部具有强大揭露力量的著作《故宫二十五年魅影录》在事隔30年之后由文史出版社出书改名的《故宫盗宝案真象》。值得注意和高兴的是就在差不多出书的同时，我们海峡对岸的台湾也发表了一些揭露故宫冤案的文章。

父亲在故宫工作的十年，虽然主要是负责行政工作，但是在编辑出版方面却也投入了大量的精力，《故宫周刊》和叫做《故宫》的书画集，都是他主编出版的重要刊物。此外，在他的主持和筹备之下，成立了一个在当时具有最新现代化机器设备的故宫印刷厂。我至今记得他和印刷厂负责人留学德国的印刷业专家杨心德先生频繁接触商讨研究工作的场景。

在今天还留下的有限记忆里，我对父亲最深刻的印象是他的勤奋，是他对所喜爱事物的绝对专注。他的业余活动第一是绘画，依次是书法、篆刻、小品文的撰写和吟咏诗词。他写过一部《中国国文法》，还写过游记，写过剧本。我从二十岁开始写第一个以抗日战争为主题的剧本《凤凰城》，素材就是父亲提供的，也是由于他的授意写成剧本的。

七八岁时见到过的情景至今还如在眼前。父亲在家里总是聚精会神地伏案写、画；欣赏古玩店送来或是他自己从古玩店抱回来的古董字画。他永远这么忙忙碌碌，很少闲着没事干的时候。即使从1951年中风病倒以后的八年当中，在病情稍为稳定之后，由于右肢偏瘫，改用左手写字作画，迄未中断。由于左手终不若右手灵便，却使他的书画较前增加了一种古拙之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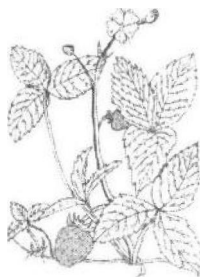
全民族受难的十年“文革”期间，我家曾经多次被查抄，幸而在五十年代父亲接受了我的意见，把他一生辛苦收藏又经历了抗日战争时期千山万水颠沛流离，备尝艰难地带在身边的二百余件古文物精品都捐赠给了故宫博物院，否则的话，这一批珍贵文物将是很难逃脱这番劫运。

“四人帮”垮台之后，一次由于搬家清理什物，从壁橱底层发现一只久未开启过的黑色木箱子。箱里放着的大都是父亲生前遗作的画幅，画的内容是祖国大地东南西北的山山水水，多半是写生之作，每幅画上都有或简或繁的题记，记下地域特征，以至时代感情。这一批为数两百余幅的作品作于抗日战争在西南后方流浪的时刻。当时河山破碎，百姓流离，故国之思，人琴之痛，都藉手上纸笔倾注而出，每一笔都流露老人的乡土深情和爱国主义胸怀。除父亲的画之外，还发现十几幅工笔花卉画，原来是祖母和她的两个妹妹，即我的姨婆的画，才恍然悟出父亲作画却是源自他的母系家族。但父亲的画不作工笔，看来受了石涛、八大山人的影响较大，这是他最喜爱的两位画家。

父亲生性耿直坦率，对人对事概以赤忱相见，是我一牛

学习的榜样。由于这样的秉性，在他的生活里平添了许多不幸。现在我的年纪已经超过了父亲的生时，我曾眼见过他受过的一些灾难，我也不少类此的经历。但我却很少见到他愁苦丧气，我也学习他从不寻烦恼，永远乐观，信心百倍。

2月25日，邀请了文物专家史树青、沈鹏等同志和老朋友黄苗子诸公来看了父亲的画作。我能看出这几位同志是被父亲作品的一片赤忱所感动了。我也感谢《文物天地》愿意发表其中的几幅作品。同志们并建议多选一些画幅出版画集。父亲生前不慕名利，似乎很少见到他在报刊上发表书画，更是从来也没有想过出版一部画集的打算。现在把他的少量几幅画公诸于世，已不能征得他的同意了。



永世难报的恩情

——怀念母亲

1982年5月14日晚，我应邀去前门外广和剧场看一场来自东北本溪市京剧团的演出，临近结束的时候，一位后台工作人员在场边低声唤我到后台去接电话。

电话里听见儿子欢欢的声音，说：“婆婆去世了。”

我感觉一阵晕眩，伤心，悲痛，但更多的是惶恐和愧悔。娘的一生，历经灾难，苦恼远远多于欢乐；在新中国成立之后，本应是最为幸福的日子，从50年代“反右派运动”之后三年，以及60年代至70年代的“文革”十年，娘所承担的苦难是常人所难以忍受的。而究其灾难的根源，却完全是由于她的儿子——我。照老的说法，真正是“不孝儿罪孽深重”。

娘姓周，名景桃，嫁到吴家，改名琴绮，生于1894年，即清光绪甲午20年，今年应是96岁了，出身于浙江杭州的官宦人家。留着胡子的清瘦的外祖父曾来过北京我家小住，那时我很小，但留有印象，而且是好印象。为什么是好印象呢？因为听娘说过，那时女孩子都要缠足，但娘的脚却没有

缠成祖母那样的“三寸金莲”，而是接近于现代女孩的天足模样。原因是大人给她缠足时，稍一用力她就大声哭叫，而父亲立即进行干预，才落得现在接近大脚的形状。娘是外公的第四个“最小偏怜”的女儿，于是得到比三个姐姐更多的怜爱。因此我也喜欢我的十分慈祥的外公，虽然只有很短时期的相处。

父亲弟兄三人，伯父行二，叔父行五，父亲行三是当中的一个。三兄弟出自江苏常州的书香世家，都是诗书的行家，尤其父亲是诗、书、画、篆刻的名家，因此交游十分广阔。他从二十几岁便来到北京扎根立业，北京古都著名的文化街琉璃厂书画古玩店的老人们至今还有人记得吴三爷是频频光顾的客户。由于父亲的交游，家里经常高朋满座；客人在家里食饮亦是常事，因此母亲便常常要亲自去指挥厨师置办膳食。而我家还有最受尊崇的祖母是长年素食的佛教徒。祖母的素食则总是由母亲亲自下厨置办，从不假手于厨师的。

母亲的更重的负担是今天令人难以置信的。她是一个多子女的母亲，生过 15 个子女，7 个男孩，8 个女孩。其中一女三男早年亡故，成长起来的 7 个女儿、4 个儿子则至今健在；最大的姐姐已经 76 岁，最大的男孩则是我。今年 73 岁了。

这样一个老少三代、多子女的家庭中，母亲上有婆母，中有交游广阔的丈夫，下有众多子女，可以想见她的负担会有多么繁重。在我的记忆里，家里日常的佣工除门房、厨师和服杂役的女佣、祖母和母亲各从南方带来一名丫环之外，

经常还有两个到三个奶妈。因为婴儿不断出生，而母亲却不能亲自给孩子喂奶，事实上她即使能够喂奶也不可能喂这么多的儿女的。

娘给我留下的最美的品德，是她对所有受雇佣工的友善关系。终其一生，任何人也没有看见过娘对她的佣人有过哪怕是丝毫疾言厉色。她忙了一天下来，常常见到和奶妈、佣妇们坐在一起闲谈，是她很大的乐趣。我们家的两个来自南方的丫环都是在 20 岁左右，由娘为她俩选定对象，像嫁女儿一样陪送了新制的衣物嫁出去的。年长一些小珠嫁到南方。后来断了联系；年轻些的小玉嫁给在北海公园船坞的职工小陈，几十年来和我家像亲戚一般来往。两个女孩结婚离开我家时都哭的泪人儿一样不愿舍去。对这么多的子女，娘也从来没有发过脾气，更不用说对更多的亲戚朋友了。我们家的亲朋也很多，父母亲有许多表兄弟姐妹，尤其是表妹，也就是我的表姨和表姑们；这些女孩子有时在家里怄了气，常常跑到我家来找“三嫂”诉说委屈，娘就常常留她们住几天，消了气再回家。这个“三嫂子”是个最可亲近的人，在亲朋里是出了名的。

祖母是很有威严的老太太，在孙辈里最喜欢我，每天下午回家，都是祖母督促我做功课；此外还教我读唐诗，并且很多年和我睡在一床。她有三个儿子，三个儿媳，都在北京，本来是规定由三家轮流奉养，但是却和伯母与婶母都难以长期相处，都是接去不多时就又回到我家，最后终于长期在我家住下来终其天年。那是在抗日战争胜利之后，我在上海外滩租下一栋楼房，把父母亲 and 众弟妹连同祖母一起从南京